

《笑傲江湖》的政治諷喻與《明報》的轉型 (1962 - 1969)

陳素雯* 馮志弘**

摘 要

本文採用 1967 - 1969 年在《明報》連載的《笑傲江湖》為底本，並綜合研究金庸社評、六十年代《明報》、《明報月刊》、六七暴動與文革等史料，指出：

一、1962 年難民潮後，金庸已經形成了他對中國國內政局的基本看法。他在這時候寫作的〈讀史隨筆〉，也有相當濃厚的政治諷喻意識。

二、1964 年 10 月後，金庸不再避諱直接批評國內政局，自始以後，諛詞頌歌式的情節開始在他的小說出現。

三、金庸認為《明報》、武俠小說同時具備「秉持正義」的精神。其時《明報》讀者十分清楚金庸的政治態度。讀者在《明報》同時讀到金庸的社評、小說，容易聯想到二者的關聯性。

四、《笑傲江湖》除了述寫權力鬥爭外，也有不少情節寓諷文革。若干部分的這些描述在《笑傲》的修訂版中被金庸刪除，因而弱化了《笑傲》初刊之時對於文革的諷喻意義。

本文以六十年代《明報》的轉型為切入點，嘗試鉤勒金庸政見、及其小說創作由「政治中立」走向「評論/諷喻政治」的發展過程，並說明其中的關聯意義。

關鍵詞：金庸、笑傲江湖、明報、明報月刊、政治諷喻

*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導師

**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導師

The Political Parable of “The Smiling, Proud Wanderer” And The Reformation of Ming Pao Daily(1962 - 1969)

Chan So-Man* Fung Chi-W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 Smiling, Proud Wanderer” which was serialized in Ming Pao Daily has from 1967 to 1969, this thesis highlights the following by studying the critics of Jin Yong, Ming Pao Daily in the 60s, Ming Pao Monthly,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1967 Riots in Hong Kong, and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 in China:

1. Jin Yong established his general view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after the incident of the flood of refugees from China in 1962. He completed “Du Shi Sui Bi”(讀史隨筆), which was full of political parables at that time.
2. Ever since October 1964, Jin Yong no longer criticized the politics of China in a direct way. He began to use odic plots in his novels.
3. Jin believes that both Ming Pao Daily and martial arts fiction ar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of upholding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It was not difficult for the readers of Mind Pao Daily at that time to be aware of Jin’s political stand and they would easily associ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 critics and his novels in Ming Pao Daily.
4. Beside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nflicts of authority, Jin Yong has also arranged a few plots to satiriz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Smiling, Proud Wanderer”. Nevertheless, Jin Yong has omitted some of these depictions in the revised edition, which weaken the irony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irst edition of this novel.

This thesis firstly depi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ng Pao Daily in the 60s, then it attempts to reveal that how the political views and fictions of Jin Yong turned from “political neutrality” to “political criticism or sarcasm”, and explicates the meaning of the connections in between.

Key words : Jin Yong, The Smiling Proud Wanderer, Ming Pao Daily, Ming Pao Monthly, Political Parable

* Instructor, School of Arts & Social Sciences,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Instructor , Chinese Civilisation Centr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笑傲江湖》的政治諷喻與《明報》的轉型 (1962-1969)¹

陳素雯 馮志弘

引言

六十年代以後，金庸²一方面撰寫社評褒貶時政，並發表批評政局、六七暴動的評論；另一方面，因著政治時風的影響，金庸也把言志與諷諭意識融入了《笑傲江湖》、《鹿鼎記》裡面，形成了金庸後期小說風格的改變。目前學術界對於《笑》、《鹿》具有政治諷喻意味已有共識。³雖然如此，這種諷喻與金庸其他文章的關係，諸如其社評、雜文、《明報》⁴、《明報月刊》⁵的關聯意義，研究得仍然很不足夠。⁶例如金庸在1962、1966、1969

¹ 本文承蒙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高辛勇教授指導、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武俠小說資料室」不吝提供珍貴研究材料、兩位評審專家提供寶貴建議，謹向各教研單位及專家學者表達敬意，並致謝忱。

² 金庸原名查良鏞，為方便討論，下文一概採用金庸一名。

³ 相關論述例如：

柳芳：「不少人指出，那（《鹿鼎記》）更像現代中國史，十年『文革』史，他（金庸）是在借清朝之古，諷『文革』之今。」〈金色的金庸〉，《讀書》（1988年2期），頁142。

嚴家炎：「『文革』初期，林彪、『四人幫』的氣焰如日中天，個人迷信極其盛行，敢於在那樣的年代，通過小說（《笑傲江湖》、《鹿鼎記》）對這類現象加以諷喻，這需要多麼超卓的膽識！」〈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在查良鏞獲北京大學名譽教授儀式上的賀辭〉，見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北京大學，1999），頁210。

陳平原：「只要對當代中國政治略有了解，都會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中讀出強烈的『寓言』意味。」〈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北京：新世界，2002），頁252。

孔慶東：「他（金庸）把當時對文革的思考，自覺不自覺地就融入了自己的小說創作（《笑傲江湖》）。」《金庸評傳》（鄭州：鄭州大學，2004），頁144-145。

⁴ 《明報》創刊於1959年5月20日。

⁵ 《明報月刊》於1966年1月創刊。1969年12期《明報月刊》〈編者的話〉載：「本刊創刊之時，適逢中共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讀者對這場史無前例的巨變，非常關心和注意。四年來我們全力集中在對中共問題的分析與研究方面，這類文章所佔的比重很大，是編輯部責無旁貸要使讀者了解真象。」，頁100。

⁶ 陳平原先生認為：「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閱讀，我們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頁250。

據筆者所見，關於《明報》發展史的研究以張主陽：《金庸與報業》（香港：明報出版社，2000）最為詳備。張先生是《明報》前副總編輯，並以相關課題作為博士論文。《金庸與報業》披露

年三次發表五則〈歷史隨筆〉以古喻今，正與他這時候的小說創作有明顯聯繫，這一點尚不為學者注意。另外，學者在論述金庸小說時多採用「明河社」在八十年代出版的修訂版，但「明河社版」和《明報》連載的版本有重要分別。譬如「明河社版」《笑傲江湖》中的「日月神教」，「連載版」原來叫「朝陽神教」，而「朝陽」正與「東方不敗」、「葵花（向日葵）」⁷相呼應，寓意「紅太陽」。這個意思在「明河社版」被刪去。由此可見，援引金庸小說的原始版本，對於瞭解其小說中的諷喻與六七暴動前後政治形勢的關係很重要。本文擬集中討論《笑傲江湖》的政治諷喻，並採用1967-1969年在《明報》連載的原版，配合金庸社評、六十年代《明報》、《明報月刊》、六七暴動與文革史料，嘗試鉤勒金庸政見與《笑傲江湖》的歷史背景的關聯意義，以深化這方面的研究。

一、1959-1961 不涉政治：《明報》的始創期

《明報》創刊於1959年5月20日。在此以前，金庸已經在《新晚報》、《香港商報》發表了《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射鵰英雄傳》等作。事實上《射鵰》的廣為流行，正是促成金庸建立自己的出版事業的主要原因。據統計，當時《射鵰》讀者約有三萬人。⁸而辦小型刊物要不虧本，銷量約有一萬就可以了。金庸原來打算辦一本名為《野馬》的武俠小說十日刊，但為爭取市場，遂決定與沈寶新合夥，共同創辦了日報形式的《明報》，並在1960年1月11日兼辦《武俠與歷史》雜誌。

《明報》〈發刊詞〉以「公正 善良 活潑 美麗」為標題，重點強調《明報》是「一張精緻的、生動的、健康的小小報紙」，並「決心要成為你（讀者）一個甜蜜的知心的朋友，跟你說說故事、講講笑話，討論一下問題，但有時候，也向你作一些溫文的勸告。」⁹同年6月6日，《明報》在社評指出該報以擁護「公正與善良」、「重視人的尊嚴」¹⁰為其

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與數據，極具參考價值。但張先生著作重點在報業，對於金庸小說未有研究。另外美國學者韓倚松先生（Hamm, John Christopher）在1999年完成以金庸小說研究為對象的博士論文，並在2005年修訂出版*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其中第五章與第七章“The Empire of the Text: Jin Yong and *Ming Pao*” “Revision and Canonization: From *Ming Pao* to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in Yong*”較多地涉及《明報》與金庸小說的關係。其中討論得最多的是《書劍恩仇錄》與《碧血劍》。第六、第八章專門討論《笑傲江湖》、《鹿鼎記》；雖然如此，這兩章在討論《笑》、《鹿》的政治寓喻時，較少和《明報》、金庸的政論聯繫上。相對於大量研究金庸小說風格、文化意義的專著來說，這方面的研究是顯得較為薄弱的。

⁷ 葵花在古代不一定指向向日葵。但「葵」寓意「向日」在杜甫詩中已有出現。例如其〈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就有「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句。見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冊1）（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265。韓倚松先生也把《葵花寶典》譯為“the Sunflower Scripture”。*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P. 147.

⁸ 參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40-41。又，張先生對於金庸創立《明報》的研究十分詳細，本文擬以人詳我略，人略我詳為論述原則，重點分析《明報》轉型與金庸小說的文化與社會意義。

⁹ 《明報》1959年5月20日。按：《明報》的創刊號曾一度佚失，後經張圭陽先生在90年代從葉逸芳先生處覓得。並將報紙圖像全部影印，刊於《金庸與報業》書中。另外本文在引述《明

立場。雖然如此，《明報》在創刊之初並不涉足政見，這主要見於：

一、《明報》早期以刊載小說為重點，尤以金庸小說《神鵬俠侶》為其「賣點」。¹¹就金庸的全部武俠小說看，最有續集意味的是《神鵬俠侶》、《飛狐外傳》，而這兩部小說正是刊載於初創立的《明報》與《武俠與歷史》，金庸並指出他寫作武俠小說有增加《明報》讀者的作用，¹²可見金庸有意吸引《射鵬英雄傳》、《雪山飛狐》的讀者閱讀《明報》、《武俠與歷史》。就小說所佔《明報》篇幅來說，以《明報》創刊號為例，就佔了全部四頁版面的兩頁。¹³除刊載《神鵬俠侶》第一回〈深宵怪客〉外，另有武俠、愛情、翻譯小說十一篇。¹⁴1960年8月31日《明報》的啟示指出：「本報武俠小說之佳，眾所共知，而本報讀者，亦十之六七為武俠小說愛好者。」¹⁵《明報》這年銷量日銷約為13,700份。¹⁶「十之六七」雖然寫得較為籠統，但也可見《明報》以小說讀者為主要銷量對象。

二、除小說外，早期《明報》多刊登影視界資訊、輕鬆通俗的文章、漫畫。很少涉及嚴肅話題。¹⁷可見這時《明報》雖然強調以「公正 善良 活潑 美麗」為立場，但實際上更多刊登武俠、懸奇、愛情、幽默作品。《明報》刊登這些通俗作品，與當時《明報》讀者主要是市井階層有密切關係。在《明報》創立以先，金庸小說最為哄動的是《射鵬英雄傳》（1957.1.1 - 1959.5.19），《射鵬》發表於《香港商報》，而《香港商報》的讀者以工廠工人、小白領為主。¹⁸《神鵬俠侶》緊接《射鵬》熱潮在《明報》（1959.5.20）刊

報》社評時，大部分核對了原文，但最初也是得益於《金庸與報業》的引導，不為掠美、特此說明，並致謝忱。

¹⁰ 《明報》社評〈我們的立場〉，1959年6月6日。

¹¹ Hamm, John Christopher: "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The novels, in turn,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ensuring the paper's survival, especially during the precarious early days." *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P. 119.

¹² 金庸：「我寫小說實際上是當時的一種副業，我主要是辦報紙。報紙要吸引讀者，那麼我寫點小說就增加讀者。」見江堤編：《金庸：中國歷史大勢》（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頁18。

¹³ 《明報》創刊號原稿圖象見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62-65。

¹⁴ 《明報》1959年5月20日「創刊號」小說計有：宋玉的《赤眉女傑》第一章〈綠林山〉、索漁《明清故事選·秦淮健兒》第一回〈一掌打死了狗〉、白祺英《劍馬縱橫記》一〈奇鏢異夫〉、武俠小說連橫圖〈雙雄爭霸〉。

除武俠小說外又有夏易「夏戀」《一片藍色的冰涼》之一、凌侶「香港靚女日記」〈賣貨生涯〉之一、西門穆《俠盜羅森風流奇案》之〈霧夜失屍記〉、陳錚〈德麗莎〉、岑樓〈戲假情真〉，以及翻譯作品E·羅夫的〈不穿衣服的女郎〉和雨果小說〈瘋狂的大砲〉。

¹⁵ 《明報》1960年8月31日。

¹⁶ 〈《明報》歷年銷量表〉，見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414-415。又下文凡引述《明報》銷量者均出此處，不另註明。

¹⁷ 以《明報》1959年5月20日創刊號為例，首頁轉譯美國《展望》文章〈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的真象〉，〈上床閨女 下床寡佬——香港床位住客五十萬〉，並有五則〈銀色消息〉（影視資訊）。第二、三頁全版為小說，第四頁有《紅茜信箱》〈給在戀愛中青年男女的第一封信〉、希臘神話〈人鵝之戀〉、何可〈偷信賊〉、朱明「生活點滴」〈寡佬之恤〉、劉華〈小小廣告學〉、江客〈香江述異——洗手間的生意經〉，以及〈幽默一束〉和漫畫十二格。

¹⁸ 九十年代出任明報出版社、《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編經理的潘耀明先生在〈《金庸研究》總序〉

登，其讀者對象正與《香港商報》相類。《明報》走通俗路線是符合這一類讀者的興趣的。

1959 - 1961 年的《明報》屬於通俗小報形式。就金庸與報界關係來說，金庸出身《大公報》，與左派報人較為友好，《大公報》和《明報》的記者也有在對方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左派報界也把《明報》視為左派的「周邊」報刊。但總體來說這種聯繫並不明顯。所以在當時「左派右派壁壘分明」¹⁹的環境中，《明報》沒有黨派背景使它不至於受到左、右派報章的批評，並能夠較為中立地報導社會時事，這種不「以黨派觀點評論是非」的特色為《明報》日後轉型為「文化報」提供了良好的契機。1961 年下半年，《明報》銷量上升至約 22,700 份，站穩了本地報業市場。1962 年 4 月，因著國內「大躍進」的影響，大批難民偷渡湧入香港，造成了香港社會極大震盪。對於這次「難民潮」的評論，就成為了《明報》轉型的開端。

二、1962：以史諷今的〈讀史隨筆〉·「自由談」的創立

《明報》在 1962 年 5 月後分別在社評、報導上大量刊載和「難民潮」相關的評論、消息。這固然是因為《明報》以「小市民」為讀者對象，需要報導社會重大事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金庸十分同情大陸難民，但當時左派報章對難民潮不予報導，因而促使金庸決定以大篇幅報導相關事件。《明報》對於難民潮的報導取態，也為 1964 年金庸與左派決裂埋下伏筆。

「難民潮」可以 1962 年 4 月 4 日廣東偷渡者的漁船在香港塔門沉沒為肇始。雖然如此，在整個四月內左派報章均沒有報導相關消息。《明報》與左派報章友好，亦不予報導。金庸在 1964 年 12 月的一篇文章回憶說：當時《明報》「為了顧全中共的面子，不願多惹是非，所以並不登載這些消息。」但由於受到「事實和良心的嚴重考驗」，因此決定「真實地報道(導)這個不幸的消息，發表這成千成萬同胞的苦難。」²⁰《明報》首次發表關於難民潮的消息是 1962 年 5 月 8 日，頭版報導「五百餘偷渡入境者，昨被集體遣返大陸，送行親友臨風涕泣哀聲動地」，並改寫杜甫〈兵車行〉詩句，易為標題「爺孃子弟哭相送，塵埃不見羅湖橋」。²¹同年 5 月 15 日，《明報》發表題為〈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隊上梧桐山〉的社評，並呼籲中國與香港當局派人救助難民。《明報》員工並「攜帶食物往邊境贈與各同胞。」²²

指出：「《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均在以小市民為對象的報紙刊載，《射雕》在當年香港《商報》登載（該報讀者均以工廠工人、小白領為主），《神雕》在金庸創辦的《明報》刊載，甫創刊的《明報》也是以小報形式出現，對象也是小市民。」載倪匡：《我看金庸小說》（香港：明窗出版社，1998），頁 1-2。

¹⁹ 《明報》1962.6.17「自由談」編輯室：〈有容乃大 無欲則剛——「自由談」的發刊詞〉，收錄於明報叢刊編委會：《明報自由談選輯（一）》（香港：明報出版部，1969），頁 1。

²⁰ 金庸：〈敬請《大公報》指教和答覆〉，《明報》，1964 年 12 月 8 日。

²¹ 「羅湖橋」為深圳—香港的關口。

²² 〈讀者紛紛響應本報呼籲，自願參加救援隊，上梧桐山救人〉，《明報》1962 年 5 月 16 日。

《明報》處理難民潮的報導標誌著《明報》與左派報章立場不同，也不是右派報章的一味反對中共，而是突出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尊嚴與生命的總原則，²³這個取態贏得不少讀者的認同。《明報》銷量由 1962 年上半年日銷約 29,200 份，急升至下半年的 41,805 份。《明報》銷量上升除了與難民潮的相關報導有關之外，更為關鍵的是同年 6 月 17 日創辦的「自由談」副刊。《明報》在 6 月 8 日的徵稿啟事中指出「自由談」的特色有二：

其一：「自由談」內容自由之極，自國家大事、本港（香港）興革、賽馬電影，以至飲食男女、吸煙跳舞，無所不談。

其二：啟事指出其時香港當無如此「真正自由之至」的報紙副刊，《明報》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響，為純粹的民間報紙，有條件同時刊登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文章。²⁴

從啟事可見《明報》特別強調它政治中立和民間辦報、不受黨派思想影響的特色。就當時左派與《明報》的關係來說，雖然左派報章在報導「難民潮」事件上與《明報》有分歧，但《明報》社評、報導均以人道立場出發，對於共產黨、國民黨並無批評，也不針對左派立論。同年金庸正在撰寫《倚天屠龍記》（1961.7.6-1963.9.2），也看不出對時政有何諷喻意味。因此在 1964 年 10 月和左派報章的「核彈論戰」（詳下）以前，《明報》以及金庸本人都不曾明確反對左派。雖然如此，「自由談」創立後的讀者來稿卻主要集中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文學、大陸生活回憶等方面；談飲食男女、聲色犬馬的文章十分少見。²⁵這一方面是由於當時政局發展愈來愈為人重視，更與金庸當時已經成形的政治取態有關。其中最重要的，是金庸在「自由談」創立之初，以「華小民」筆名連續發表五則〈讀史隨筆〉所表現的鮮明政治立場。

五則〈讀史隨筆〉分別發表於 1962 年 6 月 24 日、30 日；7 月 7 日、12 日、14 日。這時候金庸還不想和左派正面衝突，但對於國內「大躍進」的政策，十分不滿，因此署名「華小民」發表文章，藉史籍故事以古喻今。這五則隨筆博引史事而詞鋒銳利，對於「自由談」日後的來稿起了示範作用。五則隨筆分別題為〈不為不可成者〉、〈柳宗元·郭沫若、郭橐駝〉、〈民食不足是誰之過？〉、〈天災的好處〉、〈劉聰的「愧賢堂」〉。這五篇文章對於瞭解金庸當時的政治觀非常重要，茲將其內容略述如下：

²³ 1962 年 5 月 15 日《明報》社評：「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隊上梧桐山〉，《明報》1962 年 5 月 15 日。

²⁴ 《明報》1962 年 6 月 8 日。

²⁵ 周青在 1969 年出版的《明報自由選輯一》的〈編者感言〉中指出：「我們過去不斷地徵求讀者的意見，詢問他們『自由談』應該怎麼辦？應該著重那（哪）些內容？當時大部份讀者都主張應以中共問題和香港社會問題為重點，於是我們便堅決照辦。」頁 323-333。

〈不為不可成者〉：文章藉管仲「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²⁶之說立論，並引用《禮記·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²⁷古制，指出國家應以積穀防饑為要務，不可勞民傷財。作者並據此認為當時國內「一畝田生產廿萬斤穀」的指標，正是「不量民力而去做不可成之事。」其後又指出，據「三年必有一食」的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二年，按理該有可吃四年的財富貯積，所以不能達到這個標準，正是「勞民過甚，傷財太多」之故。

〈柳宗元·郭沫若·郭橐駝〉：〈種樹郭橐駝傳〉是柳宗元的名篇，柳文指出郭橐駝種樹的秘訣，不過在於順乎樹木的天性，不窒礙其生長。藉此諷刺執政者過多的政策只會對百姓做成干擾，「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²⁸在論述〈種〉文後，華小民（金庸）又添上一筆，謂「中共人民公社的領導者在紀念柳宗元之餘，不知也讀一讀這篇〈種樹郭橐駝傳〉否？」這就帶出了藉古喻今的意思了。

〈民食不足，是誰之過〉：〈民〉文一開始就指出「大陸上有嚴重的糧食缺乏」，並認為國內執政者「以『天災』兩字，解釋了一切，所有制度的不善，處理的不當，完全絕口不提。這是難以令人心服的。」其後展開論述，指出古代每逢民食不足，皇帝多會嘗試究其原因，或「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或「天類示戒」，這都表現了皇帝時時醒省自己的過失。其中雖然有諛美之嫌，但這種罪己的氣度還是教今人汗顏的。文章以此諷刺國內三年旱災雖是天災，但更多是人為、政策失誤之過。

〈天災的好處〉：〈天〉文有一段文字直接引用了當時國內的術語，引錄如右：「永平八年，又有日蝕，（漢）明帝叫百官大鳴大放，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將各人批評皇帝的鳴放言論公開，叫百官傳閱，等於是張貼批評皇帝的「大字報」。）」其中的「大鳴大放」、「大字報」都是當時盡人皆知的時政用語，較之於上述三則隨筆，這篇文章更顯金庸批評時政的幽默與尖刻。

〈劉聰的「愧賢堂」〉：文章指出五胡亂華時漢昭武帝劉聰荒淫狂虐，當時「群臣之馬屁功夫，實已登峰造極」，諸如「往也唐虞，今則陛下」，劉聰照收不誤，「君

²⁶ 黎翔鳳校注、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牧民》（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4。

²⁷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王制》（上冊）（北京：北京大學，1999），頁397，377。

²⁸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柳宗元集》（冊2）（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474。

臣雙方面皮之厚，也可『曠世少比』。」可是，劉聰後來終於虛心納諫，並將一座廳堂名為「愧賢堂」，公開承認過失，表示愧對賢人。〈劉〉文並未直接評論時政，但讀者配合當時時風來看，不難聯想到國內的「個人崇拜」。筆者認為，把這段文字看作後來《天龍八部》（1963）、《俠客行》（1966）、《笑傲江湖》（1967）、《鹿鼎記》（1969）中星宿派、雪山派、朝陽神教、神龍教「諛詞」的雛型，也是可以的。

從上述文字可見，金庸這時已經否定「大躍進」政策，也對國內流行的「諛詞」十分不滿，這和他後來在《笑傲江湖》中表達的諷喻思想是完全相同的。另一方面，金庸在1962年5月至1964年10月期間，仍然不想以「金庸」的名字「挑釁」左派，所以署名「華小民」發表自己的政見。如果再特別留意他影射國內「政治諛詞」的第一個人物，《天龍八部》中星宿派的星宿老怪丁春秋，可以發現其弟子所用的諛詞，例如「他老人家（星宿老仙）一蹬足天崩地裂，一手日月無光！」「星宿老仙大袖擺動，口吐真言，叫你旁門左道的一眾牛鬼蛇神一個個死無葬身之地」等，²⁹都是在1964年12月以後才在小說中大量出現。³⁰可見金庸在1964年以前對於左派的態度，是不欲挑起爭端，也不想《明報》、自己成為左派攻擊的對象。但他願意開放《明報》的投稿園地，讓讀者發表他們對於政治、社會的看法。他並以金庸、查良鏞以外的名字發表批評國內時政之失的文章。

「自由談」的創立提供了一種「海德公園式」的園地。著名學者曹聚仁在「自由談」的投稿中指出這種精神即所謂「Fair Play」，讓自己和「對手」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³¹「自由談」的出現吸引了不少知識份子的注意。讀者野鶴在1962年7月28日的來稿中指出「目前的自由談充滿了濃厚的書生色彩。」同年12月14日，讀者伐木者談到了他對《明報》形象的改觀：「在自由談未面世時，我從沒拿一角錢買過一份《明報》……可是在上兩個月變了，《明報》突然爆出一個『海德公園』的自由談……後經友人推薦（就開始讀起來）。」1963年上半年，《明報》銷量上升至約日銷52,100份，較半年前上升了近25%。「自由談」的出現標誌著《明報》向文化報轉型，而「自由談」中出現大量論政文章，包括金庸自己的〈讀史隨筆〉，也使《明報》成為了右派報章以外主要評論國內政治的園地。

綜合上述，雖然《明報》在「自由談」的徵稿啟事中強調「自由談」內容無所不包，

²⁹ 《天龍八部》的連載時間是1963.9.3-1966.5.27，首次出現「諛詞」的情節為阿紫與「星宿派」摘星子對戰時，星宿教眾對於師兄、師姐、星宿老人的頌揚之語。詳見金庸：《天龍八部》第四部〈六 碧玉王鼎（74）〉《明報》，1964年12月5日及往後的情節。

³⁰ 在《天龍八部》中，丁春秋出場時（1965年2月25日）已經是小說的後半部分了。其中引文的「牛鬼蛇神」之語就明顯挪用了國內的政治術語。見金庸：《天龍八部》第五部〈七 當眾揭秘（93）〉《明報》，1965年12月21日。

³¹ 曹聚仁：〈海德公園的精神〉：「海德公園的精神……即是一場遊戲或球賽，應得包括對手在內，沒有對手，就玩不成這場遊戲，不管勝負如何，我們應該尊重對手。」《明報》，1962年10月14日。

但「自由談」的來稿一開始就以政治話題為主，這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與《明報》對於 1962 年「難民潮」的同情有關，也與學者論政和金庸自己的文章有關。「自由談」的創立使《明報》與左派報章的關係更疏遠。1964 年 10 月《明報》與左報的論爭，究其源流，也可說是金庸政見與「自由談」主導思想的順理成章的發展。

三、1964 年 10 月《明報》與左派報刊決裂·金庸強調《明報》的人道立場與其武俠小說「堅持正義」的精神相通

1964 年 10 月論戰的主因，是《明報》反對中國研製原子彈的國策。是年 10 月 16 日，中國試爆原子彈成功。10 月 20 日，《明報》在社評中指出「核彈是一種罪惡……我們不贊成中共製造核彈，決不認為那是中國人的光榮。做一件有害人類的事，何光榮之有？」10 月 30 日，社評題為「寧要褲子 不要核彈」。《明報》反對核武，原因是基於它的人道立場：核子武器為害人類，必須予以消毀。這種意見雖然與黨派政見無關，但卻徹底觸怒了左派，他們斥責《明報》主事人「為了政治目的和幾文錢（指銷量），便不擇手段，妖言鬼話也被他們（《明報》）用來咒罵中國的原子彈。」³²關於這場論爭的具體過程，張圭陽先生已有詳細研究，這裡不做重覆討論。³³本文更關注的是，金庸在這年年底不再忌諱以筆名「金庸」發表政論文章，從而直接表達了他對於左派若干政治行為的貶評——這是 1964 年年底後，《天龍八部》、《笑傲江湖》所以出現大量政治諷喻的重要背景。

1964 年 12 月 8 日，金庸在《明報》發表了題為〈敬請《大公報》指教和答覆〉的文章，回憶《明報》在 1962 年報導難民潮的取態。文章指出，金庸明知道刊載難民潮消息「會得罪許多朋友」，「會使我們（《明報》）負上許許多多的罪名」，金庸並指自己出身於《大公報》，深知對方「對付異己的態度」，對於決定刊登難民潮消息，金庸說自己「是怕的」，甚至「想到自己（的）安危和妻子兒女（的安危）」可能受到威脅。那麼《明報》決定刊登難民潮的原因是甚麼呢？金庸的回答是：「一個人一生只能活一次，總不能讓以後的歲月永遠在慚愧和羞恥之中度過。」並且，金庸又把武俠小說中的精神和《明報》當年的報導聯繫上，他指出：「《明報》刊登過許多武俠小說，我們讚揚堅持正義的心靈，難道在說了許多年風涼話之後，當自己遇到危機的時候，就去做卑鄙無恥的小人麼？」金庸並說當時（1962 年）已隱隱感到不久將來，「左派的宣傳者便會借故來向我們進攻了。」文章發表於「核彈論戰」期間，可見文中的「預感」即指「論戰」。這樣金庸就把 1962 年的報導和 1964 的論戰的因果關係扣上了。

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於，它說明了在「核彈論戰」以後，左派對於金庸的評價已經

³² 金石：〈明報何以妖言惑眾〉，《文匯報》，1964 年 10 月 27 日。

³³ 參張圭陽：《金庸與報業》第八章〈筆戰〉，頁 125-133。

非常負面，金庸在此之前因為「不願多惹是非」³⁴而用「華小民」名字發表政見的原則已經不管用，反而促使金庸不再避忌地發表政見。《天龍八部》、《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記》的明顯諷喻都在1964年以後，與金庸的這個轉變是有密切關係的。另外，金庸又以個人身分而不是以〈社評〉立論，並寫出「金庸出身於《大公報》」等個人與左派的淵源，從而更清楚地表示了他自己對於左派的看法。這種看法訴諸於其「正義的心靈」³⁵，不願永遠慚愧與羞恥。更重要的是，金庸把這種心靈、《明報》在創刊之初「重視人的尊嚴」的立場，和他的武俠小說的精神相聯繫，從而把《明報》精神與武俠小說精神視為一體兩面的表現，溝通了現實世界和武俠世間的畛域。後來在文革中，金庸把自己「對政治中齷齪行徑的強烈反感」，反映在「每天撰寫一段的武俠小說（《笑傲江湖》中）」³⁶亦可以視為這種精神的進一步發揮。其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把武俠精神引申至現實世界，後者則把現實世界中「當權派和造反派」的「爭權奪利」、「人性的卑污」，³⁷移入了小說的江湖裡面。

四、《明報月刊》的文化意義·金庸的「牛鬼蛇神體」

1965年上半年，即「核彈論戰」結束的半年內，《明報》銷量攀升至日銷約80,200份，較論戰時日銷約65,300份增加了近23%。同年5月25日，讀者夢嬰在〈明報報慶感言〉指出：《明報》的特色是「獨立言論」、其「敢於錚言（的作風）」正是所能吸引廣大讀者的共鳴的關鍵所在。」5月30日「一讀者」謂：我推崇《明報》的地方大致有三點：其一，引導讀者關心國內外大事；其二，《明報》很有「中國人觀點」和「香港人觀點」。其三，發揚民主精神和具有自由的作風。³⁸這些意見大抵可以代表六十年代中期《明報》讀者對《明報》的評價。另一方面，當時許多剛來港的國內移民也視《明報》為他們的同情者。

1965年6月2日，讀者江河在「自由談」發表題為〈明報才是我們的同情者〉的文章。文中指出「自由談」的創立，使許多剛移民到香港的知識青年「可以用我們僅有的筆桿子在這園地上寫出我們的遭遇，寫出我們所受的委屈，寫出中國知識青年的心聲。」這些述寫大陸生活的回憶文章還可以舉出陳儉〈中秋月夜話當年〉（1965.9.14）、胡不歸〈難忘的「勞動教養」〉（1965.10.25-26）、吳道之〈夜半割雞記〉（1965.12.3）等。同年6月5日，讀者羔羊在〈一封悲慘的信〉中認為《明報》「是最主持公道，所以我（羔羊）

³⁴ 〈敬請《大公報》指教和答覆〉，《明報》，1964年12月8日。

³⁵ 〈敬請《大公報》指教和答覆〉，《明報》，1964年12月8日。

³⁶ 金庸：「修訂版」《笑傲江湖》〈後記〉（1980年5月），《笑傲江湖》（冊4）（香港：明河社，1994），頁1690。

³⁷ 金庸：「修訂版」《笑傲江湖》〈後記〉（1980年5月），《笑傲江湖》（冊4）（香港：明河社，1994），頁1690。

³⁸ 一讀者：〈讀「本報出版六週年」有感〉，《明報》，1965年5月30日。

就當上貴報的讀者。」羔羊希望《明報》主持公道的事，是國內政策規定「父母偷渡，子女要食高價糧，子女偷渡，父母要食高價糧」，這使羔羊在國內的親人生活成了問題。最後羔羊並請《明報》編輯「寫一篇文章評評這個問題」。可見不少國內移民認同《明報》報格，方針。

「自由談」的成功使《明報》由通俗的「小說報」轉型為「知識份子報」。與此同時，籌辦了三、四年的《明報月刊》於1966年1月創刊。³⁹《月刊》的特色是文章較具文化性與學術性、也大量發表了專家學者議時論政的專文。以1966-1967年為例，與國內政局有關的文章，舉其要者有：

1. 1966.1 劉富蘭〈毛澤東性格的分析〉
2. 1966.3 隨刊附送《海瑞罷官》一冊
3. 1966.3 丁友光〈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風波〉
4. 1966.4 〈中共清算田漢的兩篇文章〉(摘錄)
5. 1966.6 章群〈郭沫若的「問題」在那裡?〉
6. 1966.6 王俞〈毛澤東寫錯了字，郭沫若說「錯得好!」〉
7. 1966.7 無野〈中共大罵史可法〉
8. 1966.12 瓦子〈中共的教育政策和權力鬥爭〉
9. 1966.12 〈紅衛兵造反圖片選輯〉
10. 1967.1-3 許冠三〈有關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幾點解釋〉(上、中、下)
11. 1967.4 丁望〈「牛鬼蛇神」點名錄〉
12. 1967.5 編者〈「清宮秘史」與中共「文化大革命」〉
13. 1967.7 明報社評〈愛國愛國，愛的是「國」〉
14. 1967.8 〈香港騷動與香港前途——文化界座談會〉
15. 1967.9 范澎濤〈「文化大革命」進入第二年〉
16. 1967.10 丁望〈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
17. 1967.11 〈文化大革命與中國前途〉(座談會)

《月刊》的創立與「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時間緊密相連，從上列文章可見，《月刊》對於文革每有即時性的討論與回應。例如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批評吳晗《海瑞罷官》，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猛烈抨擊《海瑞罷官》是「大毒草」。《月刊》隨即在1966年3月隨刊附送《海瑞罷官》劇本。1966年4月，《月刊》刊載〈中共清算田漢的兩篇文章〉，可視為批判知識份子文章的典型。1967

³⁹ 籌辦三、四年之說據《明報月刊》發刊詞：「《明報月刊》是亞洲、歐洲、美洲許多華人文化界朋友們探討商量了三四年之後的產物。」《明報月刊》(1966年1期)，頁2。按時間推算，即《月刊》大抵在難民潮後開始籌辦。

年 12 月《明報月刊·編者的話》指出：「本刊忝為香港出版的海外華文刊物之一，對這兩項事件（文革、六七暴動）的報道(導)與評論，自是責無旁貸，因此佔用了很多篇幅，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幾乎是本刊兩年來的『主題』。」⁴⁰可見這時《月刊》的文章有濃厚議政色彩。另一方面，《月刊》向為數甚廣的著名學者、作家徵稿，不少學者、讀者也主動投稿，使《月刊》一開始就以文化、知識型刊物的面貌出現。以 1966-1967 年為例，在《月刊》發文章的知名學者就有：

1. 1966.1 司馬長風〈青年棋王林海峰〉
2. 1966.1 蔣夢麟〈西潮〉
3. 1966.3 陳省身〈學算四十年〉
4. 1966.4 余英時〈涵養新知 商量舊學〉
5. 1966.5 劉紹銘〈給投考港大不第的同學〉
6. 1966.12 殷海光〈民主的優點〉
7. 1967.3 周策縱〈環球雜詩〉
8. 1967.5 費正清〈中國的世界秩序〉
9. 1967.9 岑逸飛〈一代梟雄蘇加諾〉
10. 1967.10 孫國棟〈中國近代強自運動的省察〉
11. 1967.10 夏志清〈有關「儒學研究」的幾重障礙〉
12. 1967.12 陳永明〈讀《明報月刊》的幾點感想〉

相對於論政的主調，這些學者、作家的文章牽涉面較廣，像蔣夢麟、陳省身先生的文章屬回憶錄，余英時、夏志清先生討論治學，特別是新舊文化交融的問題。劉紹銘先生寫的是給求學青年的告勉。另外像當時旅美的陳永明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發表了他對《明報月刊》的意見。陳先生在九十年代後先後出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香港教育學院語文學院院長；他在 1967 年旅美時讀到《月刊》，可見《月刊》吸引了海外華人的注意。其餘像英國讀者零雁在〈讀者來函〉中指出：「我們很需要一些有領導能力的牧人，不但能感化我們去保存中華文化，還要警醒我們，使我們認識中華文化的偉大。」⁴¹表示了他對《月刊》的期望。從這些海內、外讀者的來稿、來函可見他們肯定《月刊》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

《月刊》的創辦，加上金庸鮮明的人道立場、犀利的社評，使他「報業文化人」的形象愈益鮮明。這時候《明報》業績已上軌道，可以承擔《月刊》的虧損。⁴²隨著國內

⁴⁰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1967 年 12 期），頁 100。

⁴¹ 零雁：〈讀者來函〉，《明報月刊》（1966 年 7 期），頁 100-101。

⁴² 金庸在《明報月刊》創刊號的一封信（寫於 1965.8.2）中說：「（月刊）所以用這個名字（《明報月刊》），主因在於要《明報》拿錢出來虧累。」《明報月刊》（1966 年 1 期），頁 10。

文革在 1966 年 5 月展開，金庸在《明報》的社評亦開始大量評論文革。1966 年 6 月 4 日，《明報》發表題為〈彭真罷官？〉的社評，歸納了五月幾則社評的意見，並預測劉少奇不久將被牽涉在事件裡：「本報（五月）十日社評〈彭真出了事麼？〉，十二日社評〈彭真之頭九矣〉，二十日社評〈大老闆是誰？〉……結論為『相信不出一個月，中共就會正面清算這位大老闆了。』……彭真之上，那就要牽涉劉少奇了。」6 月 8 日，《明報》又在「自由談」中發表編者按語，謂「（我們）應該密切注意中共這場鬥爭的發展，因此，我們準備就此事發動一次討論。讓所有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愛國人士，踴躍撰稿。」從而把「自由談」的來稿引導到討論文革的主題之上。⁴³1966 年 10 月，饒有意味的是，金庸第二度在《明報月刊》刊載早前以「華小民」筆名發表的五則〈讀史隨筆〉，但這次直接用上「金庸」的筆名，說明了金庸對於直接批評國內政策已經不再避諱。此外金庸又在這五則隨筆前面加了一段按語：

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間，我寫了幾則隨筆，發表於明報「自由談」副刊（發表時用「華小民」的筆名）。那時正是大陸上民食不足、大批農民湧來香港之後。最近重讀，覺得這幾篇短文……有點「以古喻今」的「牛鬼蛇神體」氣息，茲重刊以博讀者一察。⁴⁴

金庸兩次發表〈隨筆〉，可見他十分重視這五則「以古喻今」的文章。同時「有點『以古喻今』」之說也有影射吳晗《海瑞罷官》事件的意思。至於「牛鬼蛇神體」則是金庸自嘲自己的文章不為左派所接受。1966 年 5 月 25 日，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文中就有「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⁴⁵之說。「按語」說明了金庸已經自知不容於左派。他在 1962 年的四年後再次發表這五篇文章，而且時間正是在文革剛發生之時，也明確地說明了他對於「大躍進」乃至文革的否定態度。這時候《明報》與《月刊》的讀者已經非常清楚金庸對於國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此同時，自 1963 年 9 月起在《明報》連載的《天龍八部》，這時（1965 年後）也漸次出現星宿派的「諛詞」。可見金庸小說的諷諭意味與他的政治態度日益明顯是並行發展的。當然最直接影響《明報》與《笑傲江湖》的，則是 1967 年 5 月在香港發生的「六七暴動」。

⁴³ 關於 1966、1967 年《明報》社評如何評價文革的問題，可參張圭陽：《金庸與報業》第九章〈樹立權威〉，頁 135-144。

⁴⁴ 金庸：〈讀史隨筆五則〉，《明報月刊》（1966 年 10 期），頁 8。

⁴⁵ 聶元梓等：〈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載李松晨、唐合儉、杜述勝主編：《輝煌 50 年——共和國檔案》之三《「文革」檔案》（上卷）（北京：當代中國，1999），頁 113。

五、《明報》對六七暴動與「文革」的回應·金庸認為「文革」源自國內權鬥

1967年4月，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5月演變為騷亂。同年4月20日，《笑傲江湖》開始在《明報》連載，迄1969年10月12日全部刊載完畢。這兩年半的時間正是國內和香港最動盪的時期。在此之前，金庸雖然已和左派決裂，但僅涉筆戰；「六七暴動」發生後，《明報》報社曾經收到郵包炸彈，金庸因為人生安全受威脅一度離港。這使金庸更直接也更深刻地體會到當時的政治氛圍，《笑傲江湖》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寫成的。關於「六七暴動」的問題論者已有專門研究，限於篇幅，這裡僅鉤勒暴動對《明報》、金庸的影響。⁴⁶

六七暴動主要發生於1967年4月至1968年1月之間。⁴⁷1967年7月，左派以土製炸彈、魚炮發動街頭襲擊，8月24日，商業電台主持林彬因嘲諷左派被殺。一個自稱「地下鋤奸突擊隊司令部」的組織宣稱殺害林彬是「執行民族紀律」。⁴⁸其後，金庸住宅、《明報》報社先後收到炸彈郵包。8月28日，《中國郵報》列出了一份左派要殺害的人士的名單，「《明報》社長查良鏞」位居其中，金庸被迫到新加坡暫避。⁴⁹

暴動期間，《明報》採取同情工人，反對騷動的態度。1967年5月17日《明報》社評謂：「我們贊成和平和勞工運動，反對騷動和使用暴力……我們一貫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事件之所以惡化，根本原因在於在勞資糾紛之中，摻雜進了政治因素。」6月6日，《明報》委婉地指出左派暴動有損國內執政者形象，未必符合中國觀點：「我們只希望他們（左派）自己撫心自問：『為了少數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400萬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礙到中共對香港的基本國策，損害了毛澤東思想的威望，是否應該？』」

⁴⁶ 相關資料可參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2000）。梁家權等：《英方絕密檔案暴光——六七暴動秘辛》（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

⁴⁷ 六七暴動經過略述如右：1967年4月13日，香港人造花廠因為更改僱員規定，觸發工人運動。運動的導火線是工廠政策變得苛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香港工人受到國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影響，倡議和僱主鬥爭。5月9日，《大公報》刊載了一位渣華公司職員的來信，信中說：「港英當局不要翻錯皇曆，現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已揚眉吐氣，你們不要以為中國人民可欺的。你們必須老老實實接受工人兄弟的正義要求。」5月10日，人造花廠工廠正門、橫門張貼了「港九工人大團結萬歲」、「偉大的中國人民是不可侮的」等標語，並貼上《毛語錄》和大字報。（參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頁36。）5月16日，「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立。在當年五月拍攝的一張照片中，可見大華國貨公司外牆張貼的反英標語：「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我們必勝！港英必敗」、「堅決支持港九各業工人聯合大罷工的正義行動」、「堅決展開仇視鄙視蔑視運動從政治經濟文化向英帝發動大反擊」。（照片見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頁86。內文文字由筆者據照片騰鈔。）暴動持續至1968年1月，經周恩來總理干預方才結束。據香港政府資料，暴動時共51人喪生、82人受傷，其中15人被炸彈炸死。10名警員、1名英籍軍火專家、1名外籍消防員殉職。可見暴動對香港社會構成極大震撼。參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頁113。

⁴⁸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頁104。

⁴⁹ 引見張圭陽：《金庸與報業》，頁165。

雖然《明報》已多次表明不願與左派為敵，但這時的左派已視《明報》和金庸為敵人，並運用影響力禁止《明報》銷入澳門。6月9日，《明報》發表題為〈本報被禁行銷澳門〉的文章，認為這道「禁令」對《明報》有經濟損失，「但你們（左派）想壓迫我們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你們在香港不能取得勝利，《明報》當然繼續出版，跟你們鬥爭到底。」這種「決戰」筆調在一向政治中立的《明報》社評中是十分罕見的。

《明報》一方面以〈社評〉回應左派，另一方面大量搜集國內文革消息，分別在《明報》與《明報月刊》上發表。同年《明報》銷量已達日銷90,000份，個別單日銷量更達120,000份。銷量的增加說明了讀者非常關注文革、六七暴動，而《明報》在當時掌握文革消息之多之廣，在香港傳媒來說是位列前矛的。消息的來源一部分來自《明報》編輯的搜集，另外為數不少的文章、照片則是「《明報》及《明報月刊》的廣大讀者賜寄，他們甘冒重大危險，從大陸攜帶這些珍貴的資料出來送給我們（《明報》）」，⁵⁰說明了《明報》讀者支持《明報》發表文革資訊。6月1日，《明報》發表題為〈愛國愛國，愛的是「國」〉的社評，指出部分左派人士把「愛國」二字作了一種特殊的使用：「凡是同意及擁護他們的，稱為『愛國』，不同意或反對他們的，稱為『不愛國』，甚至直截了當的稱之為『賣國漢奸』。」這個看法和《明報》、《月刊》肯定中華文化，頌揚人文精神的一貫主張相悖。⁵¹因此社評認為：「如果一個政府、政黨、黨魁的所作所為對於國家和人民是有害的，我們就應當為了愛國而反對它。」1967年7月，《明報月刊》轉載了這篇社評，⁵²可見金庸認為這篇社評可以代表《明報》集團對於「愛國」的基本理解。

同年7月，《明報》匯集為數眾多的文革文章、大字報等，由「明報月刊社」編成《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鬥爭中央機關當權派》出版。⁵³《彙編》分為「中央文件」、「重要評論」、「中央負責幹部的重要講話」、「鬥爭當權派」五部分，全面地揭示了文革的主要內容，書後附國內知識份子被批鬥的照片、「百醜圖」大字報（照片）、一張描繪「走資派」驕矜跋扈的漫畫「群醜圖」。《彙編》由丁望主編，並由金庸撰序。金庸在序文中指出：「中共這場奪權鬥爭從文化部門開始發動，以致文化上受到的摧殘特別重大……迄今為止，大陸上一片混亂，中共的權力鬥爭尚未有一個明確的結局，生靈塗炭，文物為灰，實堪浩歎。」⁵⁴可見金庸認為文革源自國內權力鬥爭。同年金庸開始撰寫《笑傲江湖》，小說中大量出現的權鬥情節，正與金庸這時對於權鬥的強烈反感密切相關。1967

⁵⁰ 金庸：〈序〉，載丁望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鬥爭中央機關當權派》（第一卷）（香港：明報月刊社，1967），頁1-2。

⁵¹ 《明報月刊》發刊詞：「我們對中華文化決不妄自菲薄。」《明報月刊》（1966年1期），頁2。1968年第12期〈編者的話〉：「所謂人文的精神——中國最可寶貴的民族精神之一，已蕩然無於中國大地。」《明報月刊》（1968年12期），頁100。

⁵² 《明報》社評：〈愛國愛國，愛的是「國」〉，《明報月刊》（1967年7期），頁57-58。

⁵³ 「彙編」前後出版共六卷，出版日期始於1967以迄1972年。第一卷《鬥爭中央機關當權派》、第二卷《鄧拓選集》、第三卷《彭德懷問題專輯》、第四卷《吳晗與「海瑞罷官」事件》、第五卷《北京市文化大革命運動》、第六卷《中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

⁵⁴ 金庸：〈序〉，載丁望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鬥爭中央機關當權派》（第一卷），頁1。

年 10 月，《明報月刊》轉載了金庸的序文。⁵⁵1969 年 7 月，《明報》出版《明報自由談選輯（一）》，第三次刊載金庸的五則〈讀史隨筆〉，為保留原貌，仍用 1962 年時「華小民」的署名。⁵⁶這時《笑傲江湖》的連載已近尾聲，情節發展至第 29 回〈喋血華山〉（7 月 18 日），9 月 8 日刊載第 30 回〈千秋萬載〉，至 10 月 12 日全文完。金庸在此時第三次發表〈隨筆〉，客觀上做成了〈隨筆〉與《笑傲江湖》的對讀，因而更呈現出金庸「以古喻今」、「以小說諷今」的關聯意義。

從上述材料可見，1964 年後《明報》社評、金庸小說的意識取態，都在若干程度呼應了當時的時局發展。「大躍進」、「文革」等政治事件不僅是中國大陸的風起雲湧，也內化到香港的政治、社會氛圍裡面，因而有六二年「難民潮」、六四年「核子論戰」、六七暴動的出現。這些事件都對《明報》乃至金庸構成直接影響，其中對於金庸的武俠小說，特別是《笑傲江湖》的影響尤其在於：一·1962 年難民潮後，金庸已經表達了對「諛詞」的不滿，並成形了他對國內政局的基本看法。他在這時候寫作的〈讀史隨筆〉，也有相當濃厚的政治諷喻。二·1964 年 10 月後，金庸不再避諱直接批評國內政局，自始以後，像星宿派以諛詞頌揚丁春秋的情節開始在《天龍八部》出現，日後並發展而為《俠客行》的雪山派、⁵⁷《笑傲江湖》的朝陽神教與《鹿鼎記》的神龍教。⁵⁸三·其時《明報》讀者已經很清楚金庸的政治態度，金庸又認為武俠小說與《明報》倡導「正義的心靈」的精神一致，加上《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讀者在同一份報紙裡讀到同一位作者的社評、小說，自然很容易聯想到兩者的關聯性。

本文認為，這種關聯性除了是寫人性的卑污、寫權力鬥爭以外，《笑傲江湖》也有部分情節直接挪用了「文革語言」和文革的典型行為，⁵⁹下面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

六、《笑傲江湖》中的「諛詞」、「權欲論」及其與金庸政治觀的聯繫

⁵⁵ 金庸：〈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序〉，《明報月刊》（1967 年 10 期），頁 57。

⁵⁶ 見明報叢刊編委會編：《明報自由談選輯（一）》，頁 3-13。

⁵⁷ 見金庸：《俠客行》〈十七·狂妄自大（246-253）〉《明報》，1967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6 日。小說中雪山派掌門白自在出任掌門以來，一直沒遇到對手，遂變得狂妄起來。其妻子史小翠評價其夫謂：「你師父（白自在）狂妄自大的性子，由來以久……想不到這狂妄自大的性子越來越厲害，竟連本派的創派祖師爺也不瞧在眼裡。」對於為白自在診治的大夫和弟子，凡是不歌頌他，不認同他是「古往今來，武功最強」的一個，他便殺之以為後快。更逼迫其弟子宣讀：「雪山派掌門人威德先生白老爺子，是古往今來劍法第一，拳腳第一，內力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傑，大俠士，大宗師。」這些頌詞與文革中常見的「諛媚稱謂」是十分相似的。

⁵⁸ 倪匡：『神龍教』是『星宿派』的進一步，是『朝陽神教』的進一步。影子是中國大陸的政局。」《我看金庸小說》（香港：明窗出版社，1998），頁 80。

⁵⁹ 金庸在修訂版《笑傲江湖》的〈後記〉中否定《笑》書影射文革（頁 1690），儘管如此，陳平原先生認為雖然金庸自己「極力否認其有所影射……但對『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極度反感，畢竟包含明顯的現實刺激。」這個說法是很中肯的。見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頁 252。

《笑傲江湖》⁶⁰是金庸小說中首次出現「一統江湖」意念之作。鄭健行先生認為這是由於當時無論是世界或中國，都出現過求變求合的強權，金庸對此戒懼不安，看成是可怕的羅網。⁶¹這是問題的一方面。本文認為，這種意念出現的原因還在於《笑傲江湖》有意淡化「江湖」與「朝廷」的界限：《笑傲》中的人物左冷禪、東方不敗是以皇帝自居的；⁶²而江湖與朝廷的權力鬥爭，明招暗箭也並無二致。這是《笑傲》中江湖與朝廷相對應的一面。另外，《笑傲》中「江湖人物」爾虞我詐的爭鬥，一方面固然是指向「每一個朝代」和「每一個國家」的政治事件、人物，⁶³但更多是指向文化大革命與香港左派，對於當時讀者造成了即時性的「聯想」，這又以小說中大量運用文革式套語與「切口」最為明顯。

「連載版」《笑傲》中的第二十三、二十四回連續出現了朝陽神教「切口」、嵩山派掌門左冷禪建封禪臺的描述。東方不敗任朝陽神教教主時，楊蓮亭創立了一套「切口」，任盈盈說：「什麼『教主令旨英明，算無遺策』，什麼『屬下謹奉令旨，忠心為主，萬死不辭』等等，便是近年來在黑木崖上流行的切口。」這套「切口」東方不敗「越聽越喜歡」，所以「到得後來，只要有人不這麼說，便是大逆不道的罪行。」⁶⁴朝陽教眾並須對東方不敗行跪拜之禮。例如上官雲在朝見東方不敗時躬身道：「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

⁶⁰ 《笑傲江湖》共有三個版本，計為：一·1967-1969《明報》連載版，同年由「武史出版社」出版單行本。這是《笑傲》的原初版本。二·1980年，「明河社」出版《笑傲》修訂版；八十年代後研究金庸小說者多採用這個版本。三·2006年，「明河社」出版再修訂版，亦稱「新修版」。筆者比較三個不同版本的《笑傲》後，發現三者，特別是前二者的改動不少。舉例有：a·段落之增刪：連載版〈一·賣酒少女〉中有一大段關於林遠圖創立福威鏢局的描寫；修訂版全部刪去。相反有一段陳述林震南接管鏢局的文字，在修訂版就移到較後位置，並改由林震南口述，內容也有較大改動。見《明報》（1967年4月20日）；「明河社版」《笑傲江湖·滅門》（冊1），頁18-19。

b·人物形象的改動：連載版令狐冲被困梅莊，謂任我行「機智閱歷，看來和向大哥也是在伯仲之間」（〈第十五章 吸星大法（446）〉）《明報》，1968年7月18日；修訂版改為「（任我行）機智閱歷，料事之能，也非向大哥所及。」「明河社版」《笑傲江湖·囚居》（冊3），頁863。曾為金庸代寫《天龍八部》的倪匡，就舉出向問天的改動作為金庸小說人物「新不如舊」的例子。《三看金庸小說》（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頁5-13。

c·人物姓名、教派名稱的改動：例如前述「日月神教」連載版叫「朝陽神教」，這一改動也牽涉到如何解釋任我行為何到華山「朝陽峰」的問題，詳本文內文。

d·文辭字句的修改：這方面的改動非常多，以本文以下引述的連載版《笑傲》原文為例，在修訂版中就全部改動過。關於金庸小說的版本問題筆者將另文再述。本文引述《笑傲》原文除特別註明外，均據《明報》連載的初版。

⁶¹ 鄭健行：〈一統江湖〉，《武俠小說閒話》（臺北：幼獅文化，1994），頁116。

⁶² 參金庸：《笑傲江湖》〈第二十三章 東方教主（648）〉，《明報》，1969年2月13日，東方不敗參見會眾時的排場；〈第二十四章 嵩山之會（680）〉，《明報》，1969年3月20日，左冷禪欲在封禪台掌五嶽盟主之位的情節。

⁶³ 金庸「修訂版」《笑傲江湖》〈後記〉：「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劃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現象……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別的國家中也都有。」《笑傲江湖》（冊4），頁1690。

⁶⁴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十三章 東方教主（647）〉，《明報》，1969年2月12日。

一名黃衣教眾雙手展開一幅黃布宣讀：「朝陽神教文成武德、仁義英明教主東方令曰：賈布、上官雲遵奉令旨，成功而歸，殊堪嘉尚，著即帶同俘虜，上崖進見。」這也和大臣朝見皇帝相似，所以令狐冲暗暗好笑：「這不是戲台上太監宣讀聖旨一樣嗎？」⁶⁵

頌美觀念可追溯至《詩經》「美盛德之形容」⁶⁶之說，其與「風刺」觀念並為儒家文學的最高標準。西晉以後，對於二者的理解漸次發展為「尚美抑刺」，⁶⁷五代十國的南唐徐鉉〈賀德音表〉有「臣等幸塵班列，無補明德，徒慙充位之譏，但賀蒼生之福。措詞有盡，順美難周，臣等無任瞻天仰德，歡呼躍踊之極」⁶⁸之句，是頌美的典型例子。頌美、跪拜有時候不免淪為「諛美」、虛禮，但也發揮了鞏固君權的作用，因此《笑傲》中任我行原來聽到上官雲「滿口諛詞，陳腔爛調」甚為不滿，認為他「直似個不知廉恥的小人」。⁶⁹但由於「無威不足以服眾。」⁷⁰後來又聽得多了「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也就「忽然覺得倘若真能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確是人生至樂，忍不住又哈哈大笑……真的稱心暢懷，志得意滿。」⁷¹

與此異曲同工，左冷禪為了一統五嶽派，遂建封禪台「登基」。令狐冲想道：「這封禪台不知是甚麼玩意兒？他說跟皇帝有關，他引大夥兒去封禪台，難道真的以皇帝自居麼？」這時令狐冲已見過東方不敗，就認為左冷禪「和東方不敗倒是知己，志同道合得很。」⁷²東方不敗，任我行、左冷禪追求一統江湖的手段各各不同，但他們都是權力的熱衷追求者。在《笑傲》中，令狐冲、任盈盈、冲虛道長等多次表達了對於權欲的態度，並闡述了他們認為權力對人性的影響的看法。任盈盈說：「我覺得，一個人武功越練越高，在武林中名氣越來越大，往往性子會變。他自己並不知道，可是種種事情，總是和從前不同了。」因此，當任我行復任教主時，她擔心「東方叔叔是這樣……爹爹，說不定也會這樣。」這是由於「一個人的性子……大權在手，生殺予奪，自然而然的會狂妄自大起來。」⁷³冲虛道長說：「權勢這一關，古來多少英雄豪傑，都是難過。別說做皇帝了，今日武林中所以風波迭起，紛爭不已，還不是為了那『權勢』二字。」而「權勢」的厲害還在於：這是一種誘人的欲念，「自古以來……英雄豪傑之士，絕少有人能逃得過這『權位』的關口。」⁷⁴《笑傲》藉令狐冲之口道出：「坐在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還是東方不

⁶⁵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三章 東方教主（648）〉，《明報》，1969年2月13日。

⁶⁶ 〈毛詩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上冊）（北京：北京大學，1999），頁18。

⁶⁷ 參葛曉音：〈論漢魏六朝詩教說的演變及其在詩歌發展中的作用〉、〈論南朝隋唐文人對建安前後文風演變的不同評價——從李白〈古風〉其一談起〉，《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1990），頁16-55。

⁶⁸ 徐鉉：〈賀德音表〉，《騎省集》卷20（上海：商務，四部叢刊本），頁138。

⁶⁹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三章 東方教主（647）〉，《明報》，1969年2月12日。

⁷⁰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三章 東方教主（664）〉，《明報》，1969年3月1日。

⁷¹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三章 東方教主（663）〉，《明報》，1969年2月28日。

⁷²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四章 嵩山之會（680）〉，《明報》，1969年3月20日。

⁷³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三章 東方教主（667）〉，《明報》，1969年3月4日。

⁷⁴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二章 恆山掌門（631）-（632）〉，《明報》，1969年1月27日至28

敗」，⁷⁵其實並無分別。

從任我行初則蔑視諛詞到後來心悅納之，可見《笑傲》所述寫的權力對人性影響之大。金庸對此十分反感，並分別通過《笑傲》的小標題、令狐冲的話斥之為「肉麻，肉麻……說這等話居然臉不紅，耳不赤，不知人間有羞恥事」。⁷⁶「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語出歐陽修斥責諫官高若訥之論，他的〈與高司諫書〉歷來被視為責備士大夫無恥的代表文章。⁷⁷金庸引用如此文句批評《笑傲》中的諛媚之徒，可見他十分蔑視這些諛媚之論，視之為古代喪盡氣節的無廉恥者。

如果把上述《笑傲》述寫權欲的情節，與金庸這時期對於文革的評價予以對讀，尤其可以呈現二者的聯繫。金庸在1967年8月謂：「十八年來，（國內政權）內部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權力的爭奪……一九六五年秋天……這一場奪權鬥爭，中共當局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⁷⁸可見金庸認為文革的肇因是權力鬥爭。這個看法在修訂版《笑傲》的後記中也有表述。⁷⁹修訂版《笑傲》〈後記〉又說：「類似的情境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⁸⁰金庸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序〉中也有類似的說法：「這一類（文革）政權的爭奪，中國歷史上不知發生過多少次。」他並舉明英宗不甘做「太上皇」，殺于謙而廢景泰帝以重掌權力為例，說明這個史實與「今日中共的政爭十分相類。」⁸¹

從上述材料可見，《笑傲》呈現的是人性酷愛權欲的普遍現象。而啟發金庸述寫權鬥的原因正是文革的發生；加上金庸同時期在《明報》發表的社評、在《文革資料彙編》的序言裡發表對權鬥的看法，讀者很容易會把《笑傲》與當時政局聯繫上。此外，《笑傲》多次寫到「明槍易躲、暗箭難防」，⁸²以及鬥爭中的「無限上綱」；這也和文革的典型鬥爭有關，說明如下。

七、《笑傲》「權鬥手段」的現實原型

《笑傲》中恆山派的定靜師太說：「敵人若是明刀明槍的來和咱們交戰，咱們一

日。

⁷⁵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三章 東方教主（664）〉，《明報》，1969年3月1日。

⁷⁶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三章 東方教主（652）〉小標題「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明報》，1969年2月17日。

⁷⁷ 歐陽修論諫官高若訥：「在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與高司諫書〉，《歐陽修全集》（冊3）（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990。

⁷⁸ 金庸：〈序〉（1967.8.24），載丁望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鬥爭中央機關當權派》（第一卷），頁1。

⁷⁹ 金庸：「修訂版」《笑傲江湖》〈後記〉：「寫《笑傲江湖》那幾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奪權鬥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笑傲江湖》（冊4），頁1690。

⁸⁰ 同上，頁1692。

⁸¹ 金庸：〈序〉，載丁望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鬥爭中央機關當權派》（第一卷），頁1。

⁸² 金庸：《笑傲江湖》〈第十六章 黑木令牌（487）〉，《明報》，1968年8月28日。

點不怕。」然而，若自己蒙在鼓裡，「就像盲了眼一樣，那不免步步驚心，不知下一步踏將下去，踏到的底是實地，還是浮冰，又還是一個萬丈深淵，你說擔不擔心？」⁸³這段話在修訂版已被刪除。相似的話在修訂版中由風清揚說出：「世上最厲害的招數，不在武功之中，而是陰謀詭計，機關陷阱。倘若落入了別人巧妙安排的陷阱，憑你多高明的武功招數，那也全然用不著了。」⁸⁴這段話為連載版所無。令狐冲被困梅莊時又說：「以他（任我行）這等人物，尚且受禁……自來光明磊落的君子，多遭小人暗算，常言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向大哥隔了這許多時候仍不來救我，只怕他也已身遭不測了。」⁸⁵任我行所以被困梅莊，是由於沒有提防東方不敗所致。當岳不群向他詢問風清揚所在時，他也說：「第一，我不知風老先生在哪裡。第二，就算知道，也決不跟你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真小人容易對付，偽君子可叫人頭痛得很。」⁸⁶話中暗喻岳不群為偽君子。從定靜、令狐冲、任我行的話可見，不論是正派或魔教中人，對於暗箭傷人之事都不免步步驚心。這和文革時的各個階級、派系、團體的鬥爭的爾虞我詐是十分相似的。

《笑傲》中的明爭暗鬥非常多，「明爭」例如華山派劍宗、氣宗之爭，朝陽神教任我行、東方不敗之爭，五嶽劍派盟主之爭，一統天下的種種爭鬥等。「暗鬥」有華山《紫霞秘笈》被竊事，以及令狐冲被誣盜取《辟邪劍譜》等，都是典型例子。這些鬥爭首先牽涉的問題是：「誰是敵人？」而如何判斷誰是敵人，通常都是由「當權派」定義的，其背後目的更多是奪取權力或排除異己。例如嵩山派費彬欲殺害儀琳，理由是他認為儀琳「和魔教妖人勾勾搭搭，姊妹相稱，自己也已成了妖人一路，自是容你（儀琳）不得。」費彬說著踏上了一步，伏劍要向儀琳刺去，儀琳對此並無置喙餘地。⁸⁷更典型的例子還可以舉出楊蓮亭、上官雲論童百熊勾結任我行的一段話。

童百熊原來是東方不敗摯交。楊蓮亭論童百熊，首先指出他早有異心，「平日仗著教主善待於他，一直倚老賣老，把誰都不放在眼裡。近年來……暗中營私結黨，陰謀造反。」對於童的企圖，楊自言「早已瞧出了端倪。」他的話為童百熊勾結任我行製造了合理動機。上官雲接著問童百熊如何和任我行勾結。楊蓮亭的回答是童百熊和任我行偷偷相會，「長談了幾個時辰，還有一名反教的大叛徒向問天在側。」「跟任我行、向問天這兩個大叛徒有什麼好談的？那自是密謀反叛教主了。」對於和任我行會面一事，童百熊的解釋是「任老弟瞧得起我姓童的，跟我客客氣氣的說話。他當我是朋友，我也當他是朋友，朋友之間說幾句話，有什麼了不起？」童又認為「只怕是教主（東方不敗）對不起人家（任我行），

⁸³ 金庸：《笑傲江湖》〈第十六章 黑木令牌（487）〉，《明報》，1968年8月28日。

⁸⁴ 金庸：「明河社版」《笑傲江湖·傳劍》（冊1），頁396。

⁸⁵ 金庸：《笑傲江湖》〈第十五章 吸星大法（446）〉，《明報》，1968年7月18日。

⁸⁶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十章 柳暗花明（587）〉，《明報》，1968年12月14日。

⁸⁷ 金庸：《笑傲江湖》〈第五章 邪魔外道（150）〉，《明報》，1967年9月16日。

未必是人家對不起教主！」⁸⁸

「和敵人聯絡、會面」是文革中典型的欲加之罪。例如中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在文革中就受到一支「紅旗戰鬥隊」的批評；理由是1964年，一天早上萬里帶著鄧小平、彭真的書信，在國際飯店會議上和陸平、彭佩雲等會面。到了晚上：

（鄧小平）談笑風生，說甚麼「看了陸平、彭佩雲在市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意見是對的，態度是好的。」於是萬里就指著桌旁的黑幫分子王漢斌對鄧小平說：「小王就是彭佩雲的愛人。」鄧與王同桌打牌幾年，此時倍覺親切，頻頻點頭，大加贊賞……鄧小平的思想感情、立場是和誰在一起的？實在是夠鮮明的了。⁸⁹

可見文革時羅織罪名的情況。就童百熊來說，他不懂避嫌和任我行見面，固然是楊否定童的原因之一，但童百熊更重要的致命傷，是他與任我行的會面體現了一種「江湖規矩」：就是稱兄道弟，識英雄重英雄。他視東方不敗為兄弟，當年和「東方兄弟出生入死，共歷患難」；⁹⁰他也視任我行為朋友，稱呼他為「任老弟」，「朋友之間說幾句話，有什麼了不起？」就這個心態來說，童百熊對東方不敗和任我行的態度並無二致。他忠於東方不敗，是因為當年二人是八拜之交，平起平坐，這種忠心更像是《水滸傳》的「忠義」，而不是人臣對君主的「盡忠」。這正是童百熊為何不再可能被「君尊臣卑」的朝陽神教所容的主因。由此可見，雖然「江湖」原來有一套「江湖規矩」，但《笑傲》又把「江湖」拉到政治的紛爭之中，二者的界限因而變得相當模糊。⁹¹

八、《笑傲江湖》「紅太陽」系列意象的政治隱喻

《笑傲江湖》中出現得最多的的隱喻，是「東方」、「朝陽」、「陽光」等一系列相關語詞，其喻意是影射文革時的中國政權。關於《笑傲》中的隱喻的問題，學術界已有較詳細的討論。吳予敏先生指出《笑傲》裡的《辟邪劍譜》、《葵花寶典》都有隱喻意味。⁹²孔慶東先生謂任我行「甚麼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當我是秦始皇嗎？」之語，使人聯想

⁸⁸ 楊蓮亭、上官雲論童百熊之語均見《笑傲江湖》〈第二十三章 東方教主（651）〉，《明報》，1969年2月16日。

⁸⁹ 北京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總部政策研究室紅旗戰鬥隊：〈揭開鄧小平搞「裴多菲」俱樂部的黑幕〉，原載《紅衛兵報》（1967.2.8），載丁望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鬥爭中央機關當權派》（第一卷），頁492。

⁹⁰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十三章 東方教主（652）〉，《明報》，1969年2月17日。

⁹¹ 吳予敏先生並指出：「金庸的後期作品……江湖上並非盡是好漢義士，江湖上的行狀事跡亦並非盡為除暴安良，劫富濟困。在構思上他複雜化了傳統武俠的天然的道義性質，把江湖看作又一個充滿政治傾軋和險惡風浪的舞台。」見〈金庸後期創作的政治文化批判意義〉，載林麗君編：《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香港：明河社出版，2000），頁347-348。

⁹² 吳予敏：〈金庸後期創作的政治文化批判意義〉，載林麗君編《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頁348。

到文革期間中國人常說的「萬歲，萬歲，萬萬歲」。⁹³韓倚松（Hamm, John Christopher）先生認為日月神教⁹⁴的種種口號、東方不敗的名字、《葵花寶典》都有弦外之音，而任我行的名字也可以理解為「無法無天」。⁹⁵本文認為，相關的隱喻還可以舉出「左冷禪」之姓「左」以寓意左派，一些明確挪用自文革的頌詞，以及「朝陽神教」、「朝陽峰」、陽光等關聯意象。特別是後者由於在修訂版有不少改動，目前尚不為學術界重視，茲說明如下。

在任我行、向問天、令狐冲上黑木崖，企圖奪回東方不敗教主之位的一段中，有這樣的描寫：「好容易到得崖頂，太陽已高高升起。只見日光從東方射來，照在一座漢白玉的巨大牌樓之上，牌樓上四個金色大字寫著：『澤被蒼生』，太陽光一照，發出閃閃金光，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⁹⁶黑木崖所以陽光普照，是由於神教以「朝陽」為名，因此崖頂正對著日出之處。小說中說朝陽神教有數百年歷史，創教教主也不姓東方；但金庸以東方不敗為現任教主名字，又以「葵花」這「向陽之花」作為教主的武功名稱，其寓意與左冷禪之姓「左」、《鹿鼎記》神龍教教主洪安通之姓「洪」（與「紅」同音），都讓人聯想到影射國內政權。而太陽光照在寫著「澤被蒼生」的牌樓上，令人肅然起敬，也使人聯想到文革時「紅太陽」的象徵意義。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第6期的《明報月刊》就刊登了郭沫若手書的〈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詩作，詩云：「在一萬公尺的高空，/在圖-104的飛機之上，/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⁹⁷1967年5月16日發表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抗議書〉中，也有「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⁹⁸之語，可見「紅太陽」象徵了中國執政者，廣義來說象徵了國內政權。

《笑傲江湖》關於太陽、朝陽的描寫還可以舉出任我行選擇在華山朝陽峰與五嶽劍派與群豪聚首的一段。連載版有以下這句，由敘述者說出：「任我行所以選定此峰和五嶽劍派群豪相會，自是另有深意。」⁹⁹這個深意，指的是任我行以朝陽神教教主身分，在朝陽峰與群豪相會，代表了他有「一統江湖」的決心。「修訂版」把「朝陽神教」易名為「日月神教」，陽光與「朝陽」的聯繫不明顯，因此上述引文也有改動，第一是不再由敘

⁹³ 孔慶東：《金庸評傳》（鄭州：鄭州大學，2004），頁148。

⁹⁴ 按：「朝陽神教」後來在修訂版中易名為「日月神教」。

⁹⁵ Hamm, John Christopher: "Ren Woxing's name, literally 'I does I will,' calls to mind Mao Zedong's notorious characterization of himself as 'a monk with a parasol—without hair or heaven' (wu fa wu tian, homophonous with 'defying law and nature') '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p.130.

⁹⁶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三章 東方教主（649）〉，《明報》，1969年2月14日。

⁹⁷ 丁友光〈郭沫若的「自我批判」〉引郭沫若〈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寫於1958.1.25），《明報月刊》（1966年第6期），頁14。

⁹⁸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抗議書〉，抗議書全文載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2000），頁283。

⁹⁹ 金庸：《笑傲江湖》〈第三〇章 千秋萬載（837）〉，《明報》，1969年9月12日。

述者說出而改由令狐冲之口說出，內容也變為任我行「選在此峰和五嶽劍派群豪相會，當有令群豪齊來朝拜之意。」¹⁰⁰這個改動刪去了朝陽峰與朝陽神教在名字上的聯繫，但突出了「朝陽」有「朝拜」的意思。可見「朝陽神教」的名稱一方面寓意「太陽」，另一方面這個「朝」字可以作動詞用，有「朝拜太陽」之意。

此外，任我行氣絕身故一段也大有深意。先是朝陽神教教眾謂：「聖教主光照天下，猶似我朝陽神教的太陽；聖教主澤被蒼生，又如大旱天降下的甘霖。人人見了歡喜。」當任我行把這些話「聽在其中，著實受用」時，聲音突然就啞了。他覺得胸口抽搐，遂把「右手按胸，要將一股湧上喉頭的熱血壓將下去。只覺頭腦暈眩，眼前陽光耀眼。」¹⁰¹陽光耀目是因為任我行暈眩，也是由於他身處朝陽峰，陽光特別猛烈所致。把這一句和上述任我行猶如「神教的太陽」對讀，就很有反諷意味了。上述「猶似我朝陽神教的太陽」一句在修訂版《笑傲》已被刪除，¹⁰²很大程度淡化了「任我行——太陽」的關聯意義。接著一段描述任我行摔倒，向問天、任盈盈一齊接住任我行，「任我行身子抖了幾抖，便即氣絕。」這一段在修訂版中也完全刪去。接著，敘述者謂：「自古英雄聖賢，元惡大憝，莫不有死。」¹⁰³由於任我行的形象有影射國內執政者之嫌，因此「莫不有死」的話雖然說的是人生的必然階段，但同時也是對於「千秋萬載」、「萬歲、萬歲、萬萬歲」的諷諭，因此是說得相當大膽的。同樣，這句話在修訂版也被刪去了。

從上述關於朝陽、太陽的例子可見，朝陽神教、東方不敗、任我行在連載版《笑傲》都有非常鮮明的寓諷。金庸在修訂版的《笑傲》雖然未始有意完全刪去文革諷喻（這可以從修訂版〈後記〉論文革；修訂版《笑傲》保留童百熊被逼害的情節看出），但這些修訂畢竟弱化了《笑傲江湖》初刊之時對於文革的諷喻意義——其中尤以朝陽神教的種種改動最為明顯。這些改動雖然加強了修訂版中「日月神教」與《倚天屠龍記》「明教」的聯繫，但減弱了政治諷喻的意味。這也是為甚麼研究金庸小說的政治諷喻必須以連載版為底本的原因。

九、「審判童百熊」的多重寄喻

《笑傲江湖》中童百熊被楊蓮雄逼迫認錯的一段描述，雖然僅止一例，但由於包涵了《教主寶訓》、孫兒指斥爺爺、逼迫手段等多重喻體，因此成為了《笑傲》中喻意最為鮮明練達的的片段。小說中楊蓮亭命人押上童百熊的兒孫，被鐵鍊鎖著的共十餘人。楊要求童家各人「那（哪）一個知教主寶訓第三條的，唸出來聽聽。」童百熊其中一個孫兒答道：「文成武德、仁義英明教主寶訓第三條：『對敵須狠，斬草除根，男女老幼，不

¹⁰⁰ 金庸：「明河社版」《笑傲江湖·拒盟》（冊4），頁1627。

¹⁰¹ 金庸：《笑傲江湖》〈第三〇章 千秋萬載（849）〉，《明報》，1969年9月24日。

¹⁰² 金庸：「明河社版」《笑傲江湖·拒盟》（冊4）的相關記述是：「……另一人道：『聖教主光照天下，猶似我日月神教澤被蒼生，又如大旱天降下的甘霖。人人見了歡喜。』」頁1649。

¹⁰³ 金庸：《笑傲江湖》〈第三〇章 千秋萬載（849）〉，《明報》，1969年9月24日。

留一人。』楊蓮亭繼續問道：「小娃娃，十條教主寶訓，你都背得出嗎？」那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讀教主寶訓，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讀了教主寶訓，練武有長進，打仗有氣力。」¹⁰⁴《教主寶訓》有寓意《毛語錄》之意。查1966年再版的《毛語錄》共分33章，約88,000字。¹⁰⁵《語錄》〈前言〉引林彪的指示謂：「要反復學習毛主席的許多基本觀點，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復學習，反復運用。」¹⁰⁶

文革中，手持、誦讀《毛語錄》是紅衛兵最常做的事。這個風氣也影響了香港。例如六七暴動發生前，香港政府職員曾致電工會調停，但接電話的女孩在電話筒只誦讀《毛語錄》。¹⁰⁷1967年5月24日一篇題為〈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發言人談話〉的文章，在千來字的篇幅中三次引用毛澤東的話作為指導思想。¹⁰⁸《笑傲》中朝陽神教的《教主寶訓》具有絕有權威，教眾須每天誦讀《寶訓》的情節，明顯取材自上述紅衛兵的行徑。此外，在「教主」的前面加上「文成武德、仁義英明」的稱謂；上官雲謂：「教主（任我行）令旨英明，算無遺策，燭照天下，造福萬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¹⁰⁹這些冠名都有影射當時稱毛澤東必冠以「戰無不勝」、「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等諸般頭銜之意。¹¹⁰

童百熊孫兒背誦了《教主寶訓》後，楊蓮亭接著又問他：「你爺爺不讀教主寶訓，不聽教主的話，反而背叛教主，你說怎麼樣？」孩子回答說：「爺爺不對。每個人都應該讀教主寶訓，聽教主的話。」楊蓮亭向童百熊道：「你孫兒只是個十歲娃娃，尚且明白道理。你這大把年紀，怎地反而糊塗了？」由於童百熊全家十餘口被脅，童的口氣也「不由得軟了下來。」¹¹¹

金庸在1981年所撰的一篇文章裡指出，注重人情和義氣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尤其是在民間和下層社會中。¹¹²金庸最喜歡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是沈從文，¹¹³沈從文小說重視表現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於人性的人生形式」¹¹⁴「我（沈從文）

¹⁰⁴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三章 東方教主（653）〉，《明報》，1969年2月18日。

¹⁰⁵ 《毛澤東語錄》在1964年5月出版，後來作過修訂。這裡用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1966年1月出版的版本。

¹⁰⁶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毛澤東語錄·前言》，頁2。

¹⁰⁷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頁30。

¹⁰⁸ 〈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發言人談話〉，全文載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頁286-287。

¹⁰⁹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三章 東方教主（647）〉，《明報》，1969年2月12日。

¹¹⁰ 語見「徹底批判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路線大會籌備處」等：〈告全國人民書——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鬥倒鬥臭〉，見譚放、趙無眠編：《文革大字報精選》（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頁71。

¹¹¹ 金庸：《笑傲江湖》〈第二三章 東方教主（653）〉，《明報》，1969年2月20日。

¹¹² 金庸：〈韋小寶這小傢伙〉（1981），全文載倪匡：《三看金庸小說》（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頁197。

¹¹³ 金庸回答觀眾的提問（2000）：「現代作家中……我最喜歡湖南作家沈從文。我從小就喜歡看他的作品，現在還是喜歡看。」江堤編：《金庸：中國歷史大勢》，頁26。

¹¹⁴ 沈從文：〈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沈從文文集》（國內版）（卷11）（廣州：花城，1992），

只想造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¹¹⁵金庸充份肯定沈從文作品人物的善良、溫情、樂觀、可愛。¹¹⁶人性中親情也是極為重要的，金庸認為，「在艱難和貧窮的環境中，如果在家再互相敵視，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充滿了冷酷與憎恨，這樣的生活很難過得下去。」¹¹⁷「在中國社會中，情義是最重要的社會規律，無情無義的人是最大的壞人。」¹¹⁸可見金庸對於中國人重人情、義氣的肯定，這兩個觀念也因此成為了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主要精神。上述童百熊被逼害的震撼之處在於：一方面東方不敗已經對他無義，但更難堪的，是他的兒孫都奉行楊蓮亭的一套，不認同他，認為他有錯。這也說明了在政治化的「江湖」裡面，童百熊一直持守的「江湖規矩」已經沒有價值。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一味頌揚與絕對的忠心。

像童百熊孫兒指斥爺爺不是的事，在文革前已見端倪。例如上述現代文學作家沈從文的兒子沈虎雛，在五十年代初上小學時就寫過一篇題為〈我的家庭〉的作文，文中指出：「爸爸（沈從文）是個國民黨時代的所謂作家……我們一家四人，除爸爸外，思想都很進步，媽媽每星期六……就向爸爸展開思想鬥爭。我想，如果爸爸也能改造思想，那麼我們的家庭，一定十分快樂。」¹¹⁹沈虎雛認為家人的思想都比父親進步，表達了希望父親改造思想的意願。這個觀念和童百熊孫兒說「爺爺不對。每個人都應該讀教主寶訓，聽教主的話」是完全一致的。文革期間，類似的親人之間的批判變本加厲。例如劉少奇女兒劉濤著名的〈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的文章就寫道：「劉少奇在政治上一貫反毛澤東思想，搞他自己資產階級的一套。」更甚者如「劉少奇的人生哲學都是活命哲學，叛徒哲學……劉少奇無恥到極點……劉處處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到極點。」¹²⁰

女兒批判父親、孫兒批判祖父的這些話，一方面悖反了「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¹²¹的傳統孝道倫理觀念，而問題的深刻性還在於：不論是《笑傲》中童百熊的家人，抑或文革中的劉濤，都是通過說這些話表示自己的忠心。這些言論不僅不會受到輿論批評，而且受到褒揚並得到社會認同，同時也是保命、擢升的不二法門。在儒家觀念裡面，孝悌是和諧的保證；相反寡廉鮮恥，則犯上作亂，無惡不作。¹²²這一種有違倫常的行為形式，在《笑傲》中，就成為了種種爾虞我詐與權力爭鬥出現的基本原因。也

頁 45。

¹¹⁵ 沈從文：〈從小說習作選·代序〉，《沈從文文集》（國內版）（卷 11），頁 42。

¹¹⁶ 金庸回答觀眾的提問（2000），載江堤編：《金庸：中國歷史大勢》，頁 26。

¹¹⁷ 金庸：〈韋小寶這小傢伙〉（1981），全文載倪匡：《三看金庸小說》，頁 208-209。

¹¹⁸ 金庸：〈韋小寶這小傢伙〉（1981），全文載倪匡：《三看金庸小說》，頁 198。

¹¹⁹ 沈虎雛：〈我的家庭〉，見吳立昌：《人性的治療者——沈從文傳》（臺北：業強出版社，1994），頁 307。

¹²⁰ 劉濤：〈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劉少奇的女兒劉濤揭發摘錄〉，載譚放、趙無眠編：《文革大字報精選》，頁 74-78。

¹²¹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坊記》（下冊），頁 1409。

¹²² 《論語·學而》：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程樹德編：《論語集釋》（冊 1）（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10-13。

正是這一點，最為金庸所不能接受，也最為重視情義的江湖世界所不能接受。

結語

從上文論述可見，《笑傲江湖》的諷喻固然有金庸所謂的刻劃人性，反映古今中外政治生活基本情況的一面；同時由於金庸撰作《笑傲》時正值國內政治運動和香港六七暴動，因此《笑傲》也呈現了金庸對於時代評價的寄喻；金庸並藉著小說述寫了「江湖」（現實）的險惡，並以若干人物、情節寫出了他對於理想社會的願景。特別是從《笑傲》的種種象徵、對話、行為可以看出，金庸有意識地把諷喻政治的意識揉合到小說裡面，這使他後期的小說呈現了極為鮮明的諷喻意味與時代性。

正如金庸在《明報》社評褒貶時政一樣，金庸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寫作的武俠小說，也鮮明地反映了他這時的政治觀念。而金庸小說與其社評的不同在於：他在社評直陳其事，而武俠小說除了有「說故事」的敘述架構之外，又更多地以「寓言」、「隱喻」、「人物性格」等方式呈現敘述者/故事本身的寓諷意味。當然小說與現實畢竟有所不同，例如文革時期，人人動輒得咎，但是在《笑傲江湖》中，所有陰謀險阻都能夠迎刃而解，從而把讀者從「現實困境」中帶到「理想世界」裡面。由於金庸以武俠小說述寫其對時局的評價時並非「敷陳其事」，因此在脫離文革的語境底下，這些寓意就愈不為人察覺。本文的意義正在於：通過詳盡仔細的「史料」與「文本」對讀，更準確地呈現《笑傲江湖》的寓意，追溯金庸政治觀念的發展歷程，從而揭示《笑傲江湖》的道德價值觀念。由此可見，武俠小說即使是「千古文人俠客夢」，這個「夢」還是需要蘊涵現實的元素——因著「日有所思」，是故「夜有所夢」。而如何做一種恰如其份的「夢的解釋」，正是研究金庸武俠小說所不能繞過的重要問題。¹²³

¹²³ 評審專家在〈審查意見〉中指出：「何以在文革過後已 20 多年，金庸反而失去過去一往無前的銳氣，對《笑傲江湖》原本極其明顯、辛辣的政治諷喻，多所迴避？從改動文字到明言非影射文革，皆不欲刻意強調？究竟是何因素導致如此？其中可有值得深思討論之處？」此說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金庸政治觀念的複雜改變。就一些基本材料看，金庸 1981 年應邀與鄧小平會面，1985 年起歷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等職務；這些新的「身份」，似乎是八十年代後金庸不欲舊作的若干政治諷喻，惹來身份尷尬的原因。但是，「明河社」版《笑傲》的出版時間在 1980 年，其時金庸尚無國內政治任命。1989 年「六四事件」後，金庸即辭去基本法草委會委員職務；2005 年 1 月 18 日，金庸在香港有線電視訪問中談論趙紫陽罹世，激動說：「他一生愛國愛民，對國家有貢獻，公道自在人心。」「我感到很難過，他這樣還得不到自由！我覺得一個好人應該有好報的！」反映了金庸對趙紫陽的評價和國內官方定調有分別。從這些事實可見金庸獨立的政治立場。因此金庸修訂《笑傲》、《鹿鼎記》政治諷喻的原因，是否只緣於其「銳氣不再」，筆者認為還可以再討論。除了政治原因外，金庸的修訂是否還與他的文學觀、歷史觀的改變有關？這個問題需要聯繫金庸八十年代的政治觀點、雜文、特別是他近年第二次修訂舊作（即「新修版」），以及他博、碩士論文的歷史觀來討論。（按：金庸的博、碩士論文均研究唐史，目前已完成碩士論文，正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筆者將繼續研究這個問題。

